

区域城市历史空间体系演变研究及保护传承思考 ——以汾河流域为例

李欣鹏¹, 胡京京², 刘梦³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建筑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 北京 100034;

3. 陕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 通过对我国城市空间区域观念的解读, 以汾河流域为研究对象, 基于对该区域城市空间体系演变历史过程的梳理, 发掘了汾河流域城市变迁、形成、成熟的历史规律特征, 探究了城市历史空间形成的主要历史阶段, 发现了区域历史空间体系与现代城市空间体系历史关联特征, 提出了建立区域空间历史连续性的保护思维和建构国土空间历史文化空间保护体系两个方面的思考启示。

关键词: 区域空间; 历史文化空间; 历史城市; 汾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 TU984.1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930(2024)06-0901-11

Reflections on the evolution,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historical urban spatial system: Taking the Fenhe river basin as an example

LI Xinpeng¹, HU Jingjing², LIU Meng³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Territorial & Spatial Planning,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Natural Resource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034, China;

3. Shaanxi Institute of Urban & Rural Planning and Design, Xi'an 710000, China)

Abstract: By interpreting the concept of urban spatial regions in China and focusing on the Fenhe River Basi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urban spatial systems in the region. It uncovers the historical regularities governing the transformation, formation, and maturation of urban areas in the Fenhe River Basin, investigates the main historical stages of urban spatial formation, and identifies the historical correlations between regional historical spatial systems and modern urban spatial systems. The study proposes two trains of thought: one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indset for protecting regional spatial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the other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storical cultural spatial protection system for national land space.

Key words: area spac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pace; historical city; Fenhe river basin

流域是国土空间重要的区域类型, 作为以河流为中心形成的城市与区域环境的复合空间系统, 是人类文明起源、发展、演进的重要区域地理单元。流域既是一个以水为中心, 以山、岭为边界包围的地理单元, 又是一个历经历史演替, 多元要素融合的城乡空间的复杂有机整体, 这其中的城市及其关键空间要素往往具有整体性强、结构关联度高的空间特征^[1]。以流

域作为区域历史空间的研究对象, 可以较为完整和准确地探讨城市空间演变的规律, 从而得到预期的客观结论。本文以汾河流域作为研究区域, 基于历史整体观, 探讨“人-地-城”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系统性和关联性问题, 从其中的演化规律、形成机制、文化内涵, 讨论区域范围内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的格局特征、文化渊源、空间结构。

收稿日期: 2023-12-25

修回日期: 2024-04-08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3YFC3803901)

第一作者: 李欣鹏(1987—), 男,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城乡发展历史与历史遗产保护研究。E-mail: 531789232@qq.com

通信作者: 胡京京(1978—), 男, 硕士, 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主要从事国土空间规划,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研究。E-mail: 13488871351@139.com

1 中国古代城市区域空间体系构建的历史传统

“方域经画，辨方守土，度地居民，都邑建置^[2]”是中国古代区域空间体系构建的重要传统。中国城市自古有着浓厚的“天下意识”和“区域意识”，并通过城市层级体系，构建了纵向关联的国家空间体系。《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舜耕历山“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历史过程。早在商代，我国就已建立了具有封建特色的中国城市文明根基，从中央到地方封国、方国、封邑，形成了一个层级分明、关系紧密的区域城市体系^[3]。《管子·度地》也有“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的说法，其中所描述的城市层级与后世城市层级体系虽有差别，但基本可以看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区域城市治理等级体系的早期特征。自秦初始，建设举国城市体系和空间网络秩序，成为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传统^[4]。秦汉以后，随着人口在广阔土地上的分布，郡县制度影响下，我国逐步形成了与行政体系相衔接的城市空间体系。城市之外，寰宇之内重要的自然山水则是支撑天下空间体系的地理坐标。秦始皇帝敕封了“嵩、恒、泰、会稽、湘、华、薄、岳、岐、吴岳、鸿冢、渚”十二山，和“济、淮、江(长江)、河(黄河)、沔、湫”六渚。汉武帝正式确立了“五岳四渚”的国家山水文化制度传统。这一传统成为历朝历代构建国家空间体系的重要基础并传承至今。以城市为核心，以山水为支撑，天下犹如一张巨大的网，笼罩大地山川，城市则是这一网络格局的节点^[5]。在国家体系之下，各区域也形成了关联紧密的城市空间体系，其本质正是天下空间体系在区域层面的具体落实，总体而言，对区域的整体经营是中国古代城乡空间建设的重要特点，不同地区根据地理、历史、人文等条件的差异，在漫长的历史演替过程中建构了各具特色而又自成体系的区域空间秩序^[6-7]。这种广泛存在的区域性，既体现于城市所在的区域，也影响着城市空间的结构格局特征。对城市历史空间区域性的讨论，是对区域环境下城市空间组织方式、演变规律和文化联系的探讨^[8-9]，见图1~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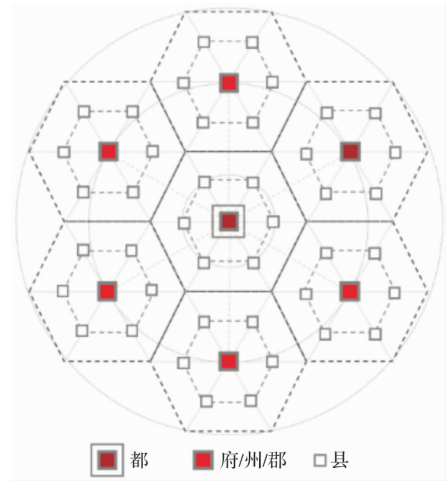


图1 “国家-区域”城市空间体系示意图

Fig. 1 “State-region” urban spatial system diagr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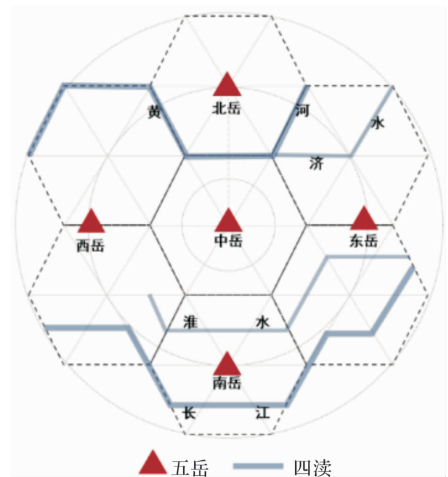


图2 天下山水空间体系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landscape space system under heav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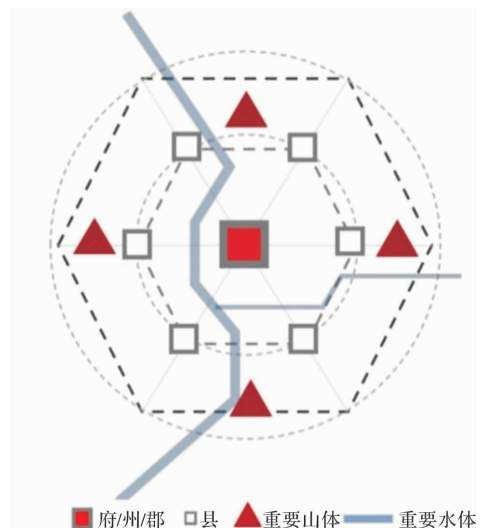


图3 区域城市空间体系示意图

Fig. 3 Regional urban spatial system diagr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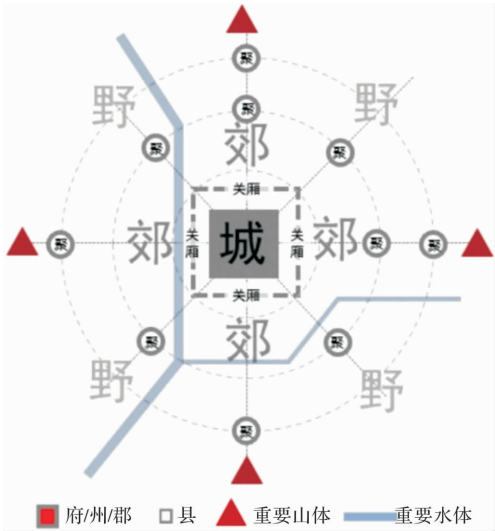


图 4 城市区域空间体系示意图

Fig. 4 Urban regional spatial system diagram

2 汾河流域区域概况

2.1 区域地貌格局

汾河流域地跨山西中部和西南部，具有典型的

河谷平原特征。东倚太行山脉、太岳山脉，西踞吕梁山，中部汾河干流自北而南纵贯山西中部，形成了“东西山脉，中夹一河，中部平坦，狭长带状”的自然地貌格局，是山西城市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汾河作为山西第一大河，全长 716 km，流域面积约 3.97 万平方公里，占山西省国土总面积的 25.3%。汾河流域西部以吕梁山脉的芦芽山、子夏山、姑射山、龙门山、罗云山等诸多山脉为界，绵延 300 多公里；流域东部以太行山脉的罕山、太岳山脉的凤山、麓台山，绵山、霍山、崇山等为界；南部以峨岭、孤山、稷山等为界，形成了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空间单元。流域南北约 413 km、东西约 188 km，呈带状空间格局。汾河流域东西侧近山区域为势高峻的台地和山地，中部为河谷平原，地势特点为北高南低，汾河各支流围绕汾河干流穿行于区域范围内，并和城市空间格局存在着紧密的空间联系^[10]，见图 5，图 6，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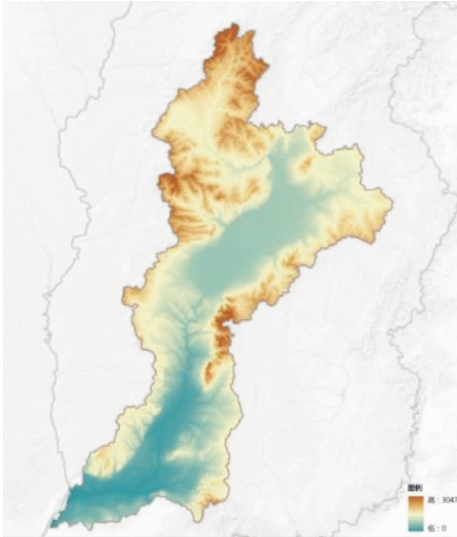


图 5 汾河流域高程分析

Fig. 5 Elevation analysis of Fenhe River bas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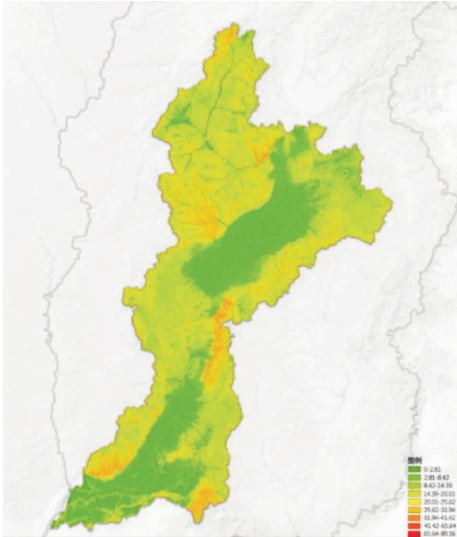


图 6 汾河流域坡度分析

Fig. 6 Slope analysis of Fenhe River bas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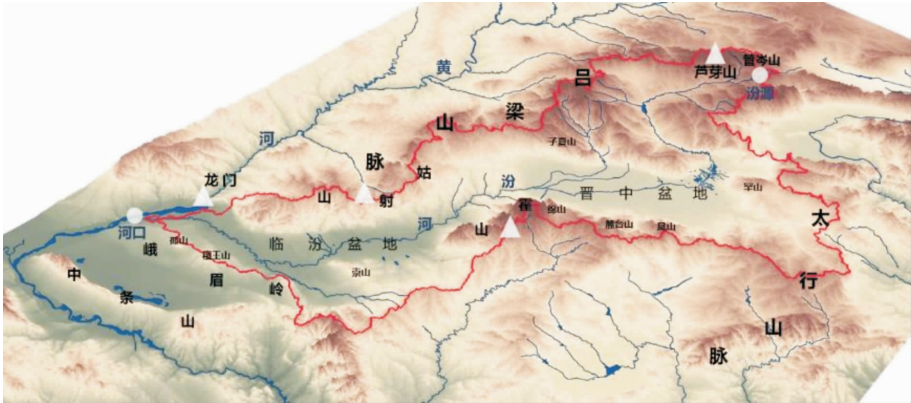


图 7 汾河流域地貌空间关系图

Fig. 7 Geomorphic spatial relationship map of Fenhe River basin

2.2 历史文化资源

汾河流域是山西历史文化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拥有各级不可移动文物1.8万余处,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同时也是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中国传统村落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全省12处省级以上历史文化名城中,汾河流域共计拥有8处,即太原、平遥、新绛、祁县、太谷、孝义、汾阳、介休。其中,太原、平遥、新绛、祁县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平遥古城作为我国保留最为完整的历史城市,1997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同时,翼城县、曲沃县两处历史城市各拥有独立历史文化街区一处。除此之外,如临汾、

榆次、清徐、交城、洪洞等其他非名城城市,其历史文化空间格局也有一定保留,且遗存有大量历史遗产。同时,一些历史上为县级城市,因行政区划调整或管理机构外迁,撤县为镇的历史城市,如汾城镇(原太平县)、岚城镇(原岚县古城)、赵城镇(原赵城县)、襄陵镇(原襄陵县)等,此类古城镇亦保留了作为历史城市的空间格局特征,且历史遗存丰富,其中汾城镇(太平县)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除历史城市以外,汾河流域也保留了大量历史村落、历史建筑群、早期文化遗址、先秦城市遗址等。见图4—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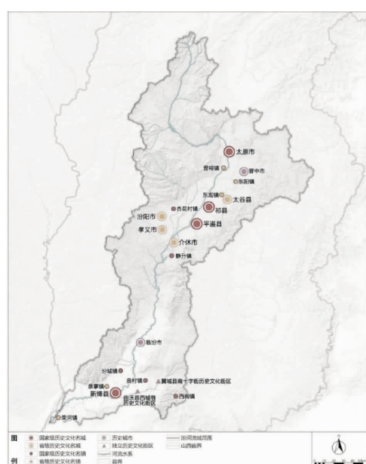


图8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分布图

Fig. 8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town, block distribution m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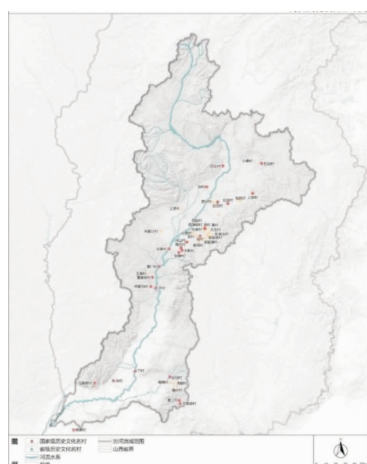


图9 历史文化名村分布图

Fig. 9 Distribution map of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ill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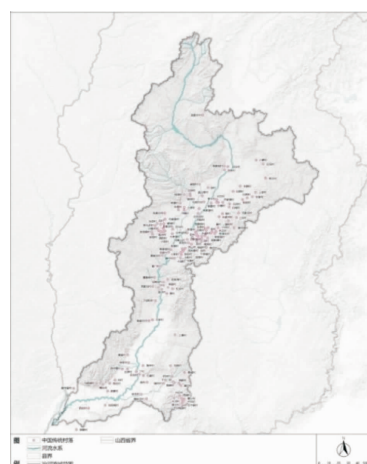


图10 中国传统村落分布图

Fig. 10 Distribution map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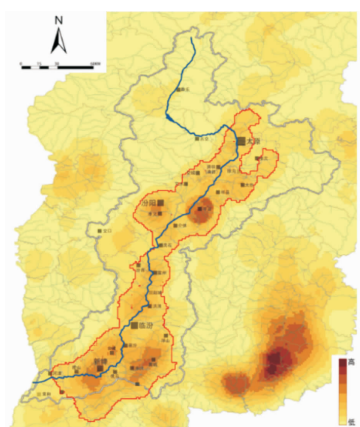


图11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分析图

Fig. 11 Density analysis diagram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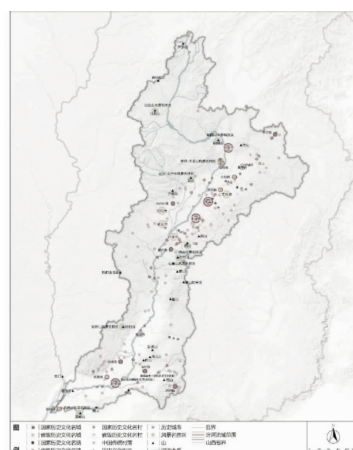


图12 历史文化资源空间分布图

Fig. 12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3 城市区域历史空间体系演变及城市格局分析

3.1 先秦时代城邑的早期雏形

春秋至战国时期是汾河流域城市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因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广泛活动,区域内各地开始出现大量城邑,形成了汾河流域区域城市体系的早期雏形。据《史记·晋世家》载:“十五年(前497年),赵鞅使邯郸大夫午,不信,欲杀午。午与中行寅、范吉射亲攻赵鞅,鞅走保晋阳。”赵简子(即赵鞅)于这一年在晋水之阳筑城,即晋阳。根据乾隆四十八年(1793年)《太原府志》载:“(太原)始建于春秋晋阳,赵鞅子宗邑也,亦即大卤(太原古称)。”后赵简子以晋阳为据点,击败中行氏、范氏,之后回到晋都绛。上述是对于山西省首府太原起源的最早历史记载。其涉及区域大体包括了汾河流域的古晋阳(今太原古县城北)、临汾、翼城、新绛、曲沃一带。而翼城、新绛、曲沃所处的区域也是晋国早期的势力范围^[9]。除太原以外,汾河流域各城市的早期起源也多始于这一时期。区域内另一处重镇临汾为唐尧旧都,历史悠久;榆次春秋时为涂水,其名始见于战国;清源(今清徐县)春秋晋国时曾为梗阳县;太谷县春秋时为晋大夫阳处父封地,名阳邑;祁县为春秋时祁奚采食邑;介休春秋时为随城;文水春秋时为平陵;孝义三家分晋时入于赵,名中阳;霍州“春秋属晋”曾为晋大夫吕氏封邑;赵城为赵氏祖先造父所封之赵城;洪洞为晋大夫羊舌肸采邑;襄陵为春秋时欲犇的食邑;太平县(今汾城)春秋时为晋国聚邑;翼城春秋以前为晋都翼;曲沃,春秋时为晋国太子申生居所;新绛春秋时为新田,后晋景公徙新田,以新田为绛,故名新绛;河津春秋时为大夫赵夙采邑。综上,包括太原在内的汾河流域多数城市,

其建设沿革可以追溯至春秋以前,且在春秋时已有城邑建设。这些城市在之后的历史岁月里虽多有迁城的情况,但对之后汾河流域城市空间体系的发展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见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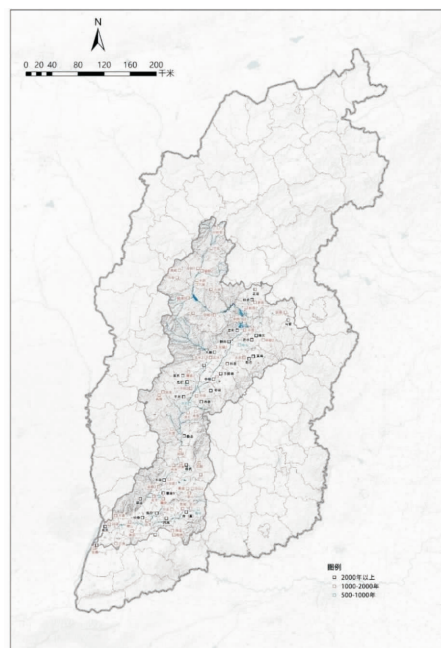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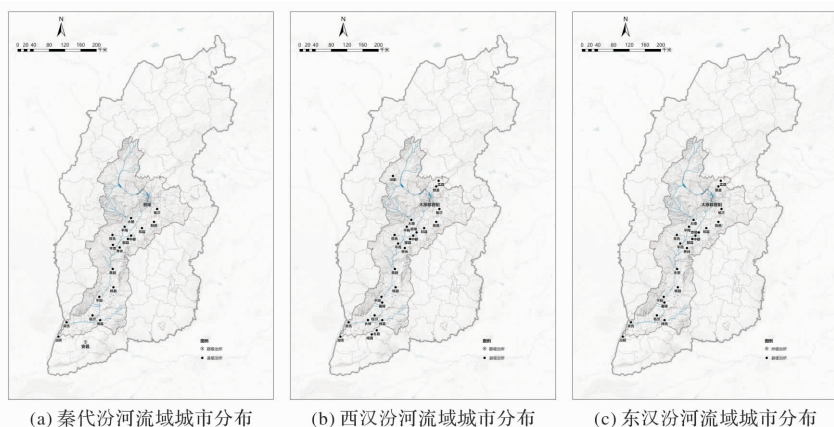


图13 历史城市起源变迁一览图

Fig. 13 Historical city origins and changes at a glance

3.2 秦汉以降城市体系的建制沿革

自秦统一全国推行郡县制始,汾河流域区域城市体系开始逐步确立。本文选取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西汉元始二年(2年)、东汉永和五年(140年)、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北魏永安二年(529年)、北周大象元年(576年)、唐元和十三年(818年)、北宋元丰十八年(1085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元至顺元年(133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共十二个历史年代,对秦代、西汉、东汉、西晋、北魏、北周、唐、北宋、金、元、明、清等时代汾河流域治所城市建制沿革演变进行分析,见图14和表1。



(a) 秦代汾河流域城市分布

(b) 西汉汾河流域城市分布

(c) 东汉汾河流域城市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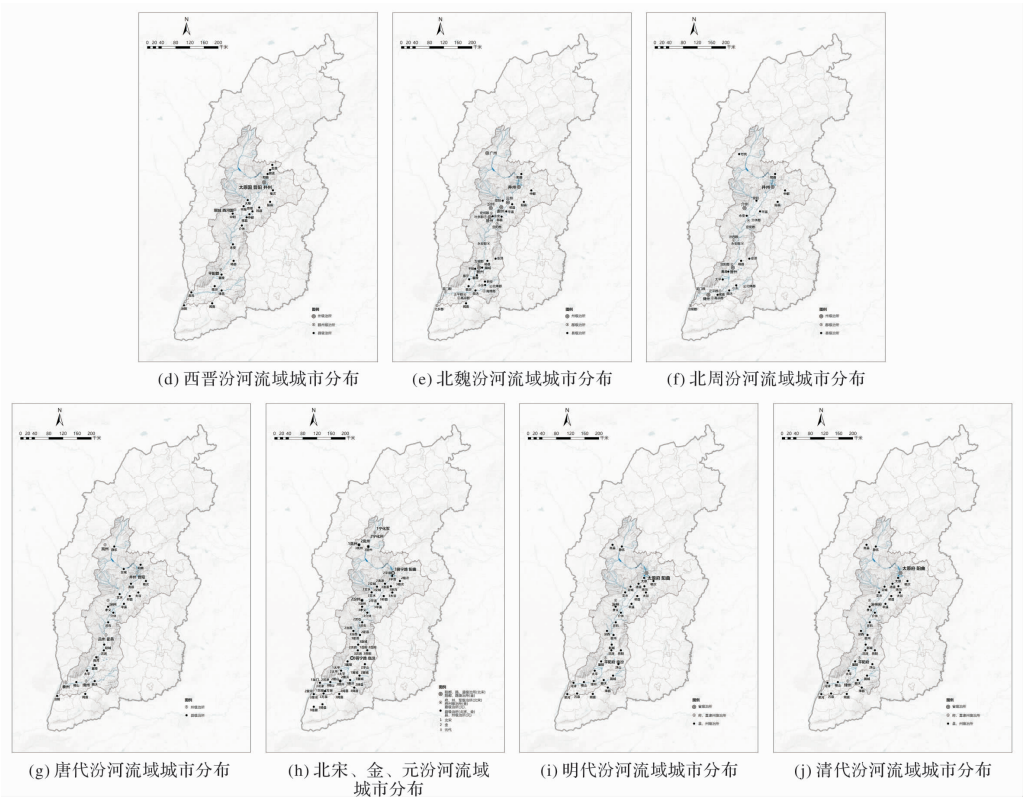


图 14 汾河流域历史城市分布演变图

Fig. 14 Fen River basin historical city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map

表 1 汾河流域城市建制沿革变迁表

Tab. 1 Change table of Fenhe River basin city system evolution

朝代及 选取年份	隶属： 国、郡、府、州	汾河流域内治所城市 (含县级州郡)	城市 数量
秦： 始皇二十六年 (前 221 年)	太原郡 河东郡(安邑)	晋阳(太原)、中都、兹氏、祁、榆次、平陶、大陵、邬、阳邑、界休、狼孟、 彘、杨、平阳(今临汾)、临汾(古临汾)、绛、皮氏、汾阴、	18
西汉： 元始二年 (公元 2 年)	太原郡 河东郡(安邑) 西河郡	晋阳(太原)、中都、兹氏、祁、榆次、平陶、大陵、邬、阳邑、界休、狼孟、 汾阳、京陵 彘、杨、平阳(今临汾)、临汾(古临汾)、绛、皮氏、汾阴、襄陵、长修 平周	23
东汉： 永和五年 (公元 140 年)	太原郡 河东郡(安邑) 西河郡	晋阳(太原)、中都、兹氏、祁、榆次、平陶、大陵、邬、阳邑、界休、狼孟、 京陵 彘、杨、平阳(今临汾)、临汾(古临汾)、绛、皮氏、汾阴、襄陵 平周	21
西晋： 太康元年 (公元 280 年)	太原国 西河国 平阳郡 河东郡	并州(太原)、榆次、阳邑、大陵、平陶、祁、京陵、中都、邬、阳曲、狼孟 西河国、介休、中阳 平阳郡(今临汾)、永安、杨、襄陵、绛邑、临汾(古临汾)、皮氏 汾阴	22
北魏： 永安二年 (公元 529 年)	肆州	广州(岢岚)	33
	并州	晋阳(太原)、榆次、中都、阳邑、祁、受阳、平遥、邬、云州(侨置)、蔚州 (侨置)、	
	汾州	西河郡(汾州)、定戎郡、吐京郡、显州(侨置)、永安、定阳郡	
	晋州	永安郡、杨县、西河郡、隰城、平阳(晋州)、襄陵、泰平、临汾(古临汾)、曲 沃、新安、北绛郡、南绛郡、小乡、	
	南汾州 司州	龙门郡 北乡郡、正平郡	

续表 1

朝代及 选取年份	隶属： 国、郡、府、州	汾河流域内治所城市 (含县级别州郡)	城市 数量
北周： 大象元年 (公元 576 年)	北朔州	岢岚	23
	并州	并州(太原)、中都、阳邑、平遥、受阳	
	介州	介州(西河郡)、介休郡、永安	
	晋州	晋州、汾西郡、永安郡、杨、定阳郡、禽昌、太平、北绛郡	
	绛州	绛州、小乡、曲沃、正平郡、龙门郡	
	蒲州	汾阴郡	
唐： 元和十三年 (公元 818 年)	岚州	岚州、静乐	29
	太原府	太原府、阳曲、榆次、太谷、清源、交城、祁县、文水	
	汾州	汾州、孝义、平遥、介休、灵石	
	晋州	晋州(临汾)、霍邑、汾西、赵城、洪洞、襄陵、神山	
	绛州	绛州、太平、翼城、曲沃、稷山、龙门、万泉	
北宋： 元丰十八年 (公元 1085 年)	河中府	宝鼎	30
	岚州	岚州、娄烦	
	宁化军	宁化军	
	宪州	宪州(静乐)	
	太原府	太原府、榆次、太谷、清源、交城、祁县、文水	
	汾州	汾州、孝义(废，后复置)、平遥、介休、灵石、	
	晋州	晋州(临汾)、霍邑、汾西、赵城、洪洞、襄陵、神山	
金： 大定二十九年 (公元 1189 年)	绛州	绛州、太平、翼城、曲沃、稷山	33
	河中府	龙门、荣河、万泉	
	岚州	岚州、娄烦	
	宁化州	宁化州	
	管州	管州(静乐)	
	太原府	太原府(阳曲)、榆次、太谷、清源、交城、祁县、文水、徐沟、平晋	
	汾州	汾州、孝义、平遥、介休、灵石、	
元： 至顺元年 (公元 1330 年)	平阳府	平阳府(临汾)、霍邑、汾西、赵城、洪洞、襄陵、浮山	31
	绛州	绛州、太平、翼城、曲沃、稷山	
	河中府	河津、荣河、万泉	
	岚州	岚州	
	管州	管州(静乐)	
	冀宁路	冀宁路(太原、阳曲)、榆次、太谷、清源、交城、祁县、文水、徐沟、平晋	
	汾州	汾州、孝义、平遥、介休、	
明： 万历四十八年 (公元 1620 年)	霍州	霍州、灵石、赵城、	31
	晋宁路(临汾)	晋宁路(临汾)、汾西、洪洞、襄陵、浮山	
	绛州	绛州、太平、翼城、曲沃、稷山	
	河中府	河津、荣河、万泉	
	太原府	太原府(阳曲)、岚县、静乐、榆次、太谷、清源、交城、祁县、文水、徐沟、太原(县)	
清： 光绪十八年 (公元 1892 年)	汾州	汾州、孝义、平遥、介休、	31
	平阳府	平阳府(临汾)、霍州、灵石、赵城、汾西、洪洞、襄陵、浮山、绛州、太平、翼城、曲沃、稷山、河津、荣河、万泉	
	忻州	静乐	
	太原府	太原府(阳曲)、岚县、榆次、太谷、清源、交城、祁县、文水、徐沟、太原(县)	
	汾州	汾州、孝义、平遥、介休、	
	霍州	霍州、灵石、赵城、	
	平阳府	平阳府、洪洞、翼城、太平、曲沃、襄陵、浮山、汾西	
	绛州	绛州、河津、稷山	
	蒲州	荣河、万泉	

根据上述图表所示，可以发现三点特征。一是自秦统一全国始，汾河流域的治所城市数量随时代不断增多，增长至 30 处左右时城市数量开始趋于稳定，元、明、清时期汾河流域治所城市数

量均为31处。北魏时期因政治动荡和军事原因,城市数量较之前代出现了短期激增,新建了大量的散州郡和侨置州郡,如显州、蔚州、云州等,但这些城市至北周时大多数消失,维持时间非常短。二是隋唐以前汾河流域的城市建制的变迁较为频繁,之后逐步稳定。结合唐元和十三年(818年)汾河流域治所城市的设置情况来看,已经初步形成与近现代趋近的区域城市建制体系。甚至多数城市建制及其城市名称已与清末乃至当代一致。从城市区域建制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汾河流域区域城市建制体系的稳定性为后续城市体系发展延续奠定了基础。三是明清时期,伴随着汾河流域区域城市建制体系的稳定,逐步确立了包括太原、汾州、霍州、平阳、绛州,五处中心级别城市。而相应的其余各县级城市的建制格局也基本保持稳定,并与中心城市形成了相对明确且持续的隶属关系。这其中,太原府既是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同时也是山西全境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区域内建制级别最高的城市。

3.3 隋唐时期区域城市格局体系的确址成型

结合上文对汾河流域区域城市建制体系的讨论,从各城市城址迁至今址的时间来看,从北魏末年至唐末时期是汾河流域城市区域格局确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各城市地理选址趋于稳定,城市的整体性迁徙情况逐步减少,多数城市城址延续至今。包括:汾州(今汾阳)、岚县(今岚城镇)、榆次县、清源县(今清徐县)、太谷县、祁县、平遥县、介休县(今介休市)、交城县、孝义县、灵石县、霍州(今霍州市)、赵城县(今赵城镇)、洪洞县、平阳府(今临汾)、太平(今汾城)、曲沃县、绛州(今新绛县)、稷山县、翼城县、浮山县,共计21处历史城市均于北魏至唐末时期迁至今址。较为特殊的是,作为山西首府的太原城,因战争原因毁于宋初,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建于今址。据乾隆《太原府志》:“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平刘氏,毁太原古城,徙州榆次,又三年(982)复迁于唐明镇,即今会城池地,此太原城之始也。”除少数如河津、万泉等城市是于元代迁至今址的,其余如静乐、襄陵、汾西、徐沟等城市于宋金时期亦已迁至今址。可见,至迟到宋初,以太原府(今太原市)、平阳府(今临汾市)、霍州(今霍州市)、汾州(今汾阳市)、绛州(今新绛县)为核心的区域城市空间网络体系即已确立,这与秦以来区域城市建制体系变迁阶段特征基本一致。

3.3 明初城市重建工作与明清城市历史空间格局的延续传承

金元两代,中国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相对动荡,汾河流域城市空间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区域空间格局并没有遭到破坏,没有出现大量的城市迁徙情况,城市建制和基本格局得到了保留。清同治二年(1863年)《榆次县志》就明确记载:“(榆次)史思明、李克用,及女真蒙古攻围者数,然旧制具存。”明初时期,中国各地城市进行了全面的重建工作,各区域府州县的城市体系也得到了强化^[1],这一时期也是汾河流域各城市重建的重要时期,同时奠定了各城市历史文化空间格局的基础形态和组织布局。例如,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灵石县志》载:“(灵石县城)明洪武间知县张先重修”;雍正七年(1729年)《临汾县志》载:“(平阳府城)明洪武初因旧城重筑”;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曲沃县志》载:“(曲沃县城)明洪武二年县丞邢彦文重修”;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绛州志》“(绛州城)明洪武元年指挥郑遇春重修”;清同治二年(1863年)《榆次县志》也同样记载了“(榆次县城)明景泰元年修筑”,且“与旧城等”。元末至明初数十年的时间里,汾河流域各城市建设进入到了高潮时期,这是在前代所未有的。需要重点强调的是,这一时期的城市重建工作,是在隋唐时期各城市所确定的原址基础上重建的,这使得自隋唐时期所形成的区域城市历史空间格局体系得到了延续,并直接影响了现代汾河流域的区域城市空间体系。

清代对明代城市空间格局,基本遵循了“清仍明置”的建设原则,延续了明代城市体系,同时,城市体系和行政体系更加紧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结合汾河流域的具体情况来看,多数是在明代城市空间的基础上进行修葺、增建和重修工作。例如太原府城在清初时,修补了各个城楼,据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阳曲县志》载“巡抚白公如梅重修大小楼,焕然一新”;再如光绪八年《汾西县志》对明代城池的修复中即提及了“国朝(清)屡有修葺”;又如清光绪六年(1882年)《河津县志》记载“(河津县城)国朝(清)历任县令因时修葺”。以汾阳为例,对比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和光绪十年(1886年)汾阳城图可见,两个时期城市历史地图中所反应的空间信息基本一致。根据其绘制时间来看,两版地图相距年代为275年,而万历汾阳城图距今已有415年。说明明清两代,汾河流域历史城市格局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见图15~图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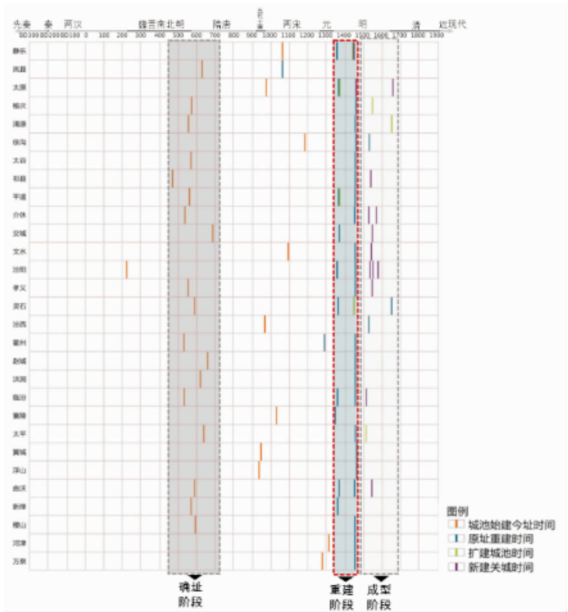


图 15 城市确址、重建、成型阶段分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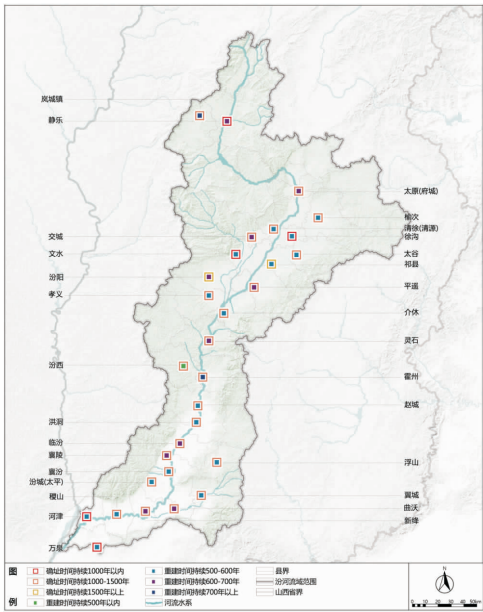


图 16 城市确址、重建时段分析图

Fig. 15 City site, reconstruction, forming stage analysis diagram Fig. 16 Urban location, reconstruction period analysis m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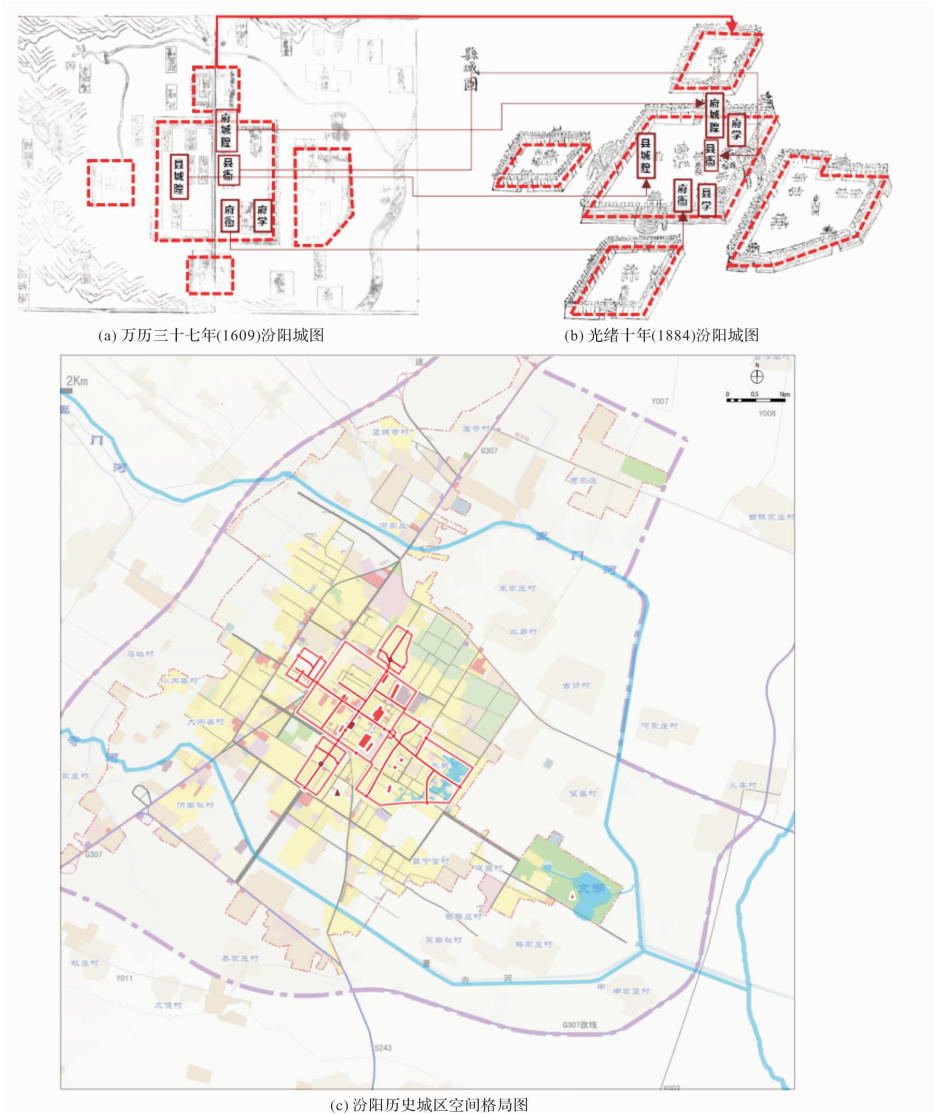


图 17 汾阳城图及历史城区空间信息比对分析图

Fig. 17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Fenyang city map and historical urban area spatial information

不难发现,汾河流域城市区域历史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的历史阶段。一是隋唐时期城市确址,以及区域城市空间体系的形成。此历史阶段对当下汾河流域区域城市体系以及城市群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二是明初各城市重建,并于明清两代延续传承至今的稳定时期。自明初汾河流域出现了各城市的集中重建活动之后,明清两代至今约550余年的时间里,各城市的空间格局有着较好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其中所保留的历史遗产、历史空间,以及城市历史结构格局,对现代城市空间格局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4 思考与启示

4.1 建立区域空间历史连续性的保护思维

通过对汾河流域城市区域历史空间格局体系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区域空间的发展变化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12]。古今城市以及区域空间体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并不仅仅是历史文化遗产的存留,更多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下,空间结构格局关系的延续。通常情况下,区域城市历史空间体系往往不被作为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工作对象。这极大程度地导致各城市在区域层面地空间关联性往往被忽视。但结合本文来看,汾河流域区域城市历史空间体系自隋唐时即已建立,并在漫长的时间岁月对现代城市区域空间体系产生了直接影响。汾河流域城市及区域空间体系“古今连续性”的历史空间现象在我国有着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以往的规划体系中,从区域层面进行保护体系的统筹建构工作尚有不足。在国土空间背景下,以古今历史连续性的思维,改观以往对“历史”与“现代”相割裂的保护方式,将历史的发展过程与现代国土空间的建设过程融为一体^[13],延续中国本土规划的历史传统^[14],为“区域-城市”的“空间关联网”^[15]和“大格局保护体系”奠定技术理论基础。

4.2 建构国土空间历史文化空间保护体系

应当明确区域历史文化遗产^[16-17]和区域历史文化空间^[18]在保护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形成针对区域范畴的统一管控技术路径。2023年12月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项目规范》和2024年1月1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国土空间规划历史文化保护技术指南》(简称技术指南)对于完善我国区域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技术体系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技术指南》明确了“历史文化保护线”的保护要求,为从国土规划层面进行全域、全要素、全类型历史文化空间要素、结构关联保护体系构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宏观制度体系的建构完善层面,在全

国范围内的实践与技术理论研究过程中,探索“历史文化保护线”在国土空间下的具体形式、特征、类型和划定方式,以及与城市历史文化空间格局结构的融合机制,是统一保护制度体系的必要过程;包括了“类型体系”“识别体系”“评估体系”等内容的相关制度文件的发布,细化、深化了现有标准、规范和指南。结合汾河流域,在国土空间“历史文化保护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流域—历史文化网络单元”的保护模式,建构从国土空间自上而下的保护层级和传导机制^[19],加快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法规体系^[20-21],对各历史城市空间保护与传承形成引导和控制要求。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汾河流域历史城市空间体系的演变过程的分析梳理,探讨了汾河流域区域城市空间分布与体系建构的历史溯源。发现现代城市空间体系与历史空间体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历史连续性过程。城市在区域空间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历史选址分布、历史层级体系是区域城乡历史文化空间资源和地域性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以区域视角探讨城市历史空间体系的保护传承,对于建构统一关联、上下传导的区域保护体系有着积极意义。历史是连续的,今天所谓“现代的城市”未来也会变成后人眼中“历史的城市”。在广袤的区域环境下,各个城市依托区域形成的整体的、关联的区域格局,是其历史的一部分,也是现代国土空间发展的基础。本文所探讨的内容和视角,希冀能够为国土空间规划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省域及市县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等相关规划技术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郭文炯,姜晓丽,张侃侃,等.汾河流域城镇变迁与城镇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GUO Wenjiong, JIANG Xiaoli, ZHANG Kankan, et al. Urban change and urbanization in Fenhe River Basin[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7.
- [2] 李欣鹏,王树声,李小龙,等.方域经画:一种区域山水人居格局的谋划方式[J].城市规划,2018,42(7): 69-70.
LI Xinpeng, WANG Shusheng, LI Xiaolong, et al. Landscape painting: A regional landscape pattern planning method[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8, 42(7): 69-70.
- [3] 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XUE Fengxua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ities and their civilization[M].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0.
- [4] 吴良镛.中国人居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社, 2014.
- WU Liangyong. History of Chinese human settlements [M]. Beijing: China Building Industry Press, 2014.
- [5] 武廷海. 规画[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21.
- WU Tinghai. Planning[M]. Beijing: China City Press, 2021.
- [6] 郭璐. 中国都城人居建设的地区设计传统: 从长安地区到当代[D]. 北京: 清华大学, 2014.
- GUO Lu. Regional design tradi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construction in Capital cities of China: from Chang'an to contemporary times[D].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014.
- [7] 严艳, 吴宏岐. 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2): 56-63.
- YAN Yan, WU Hongqin. System and research scope of historical urban geography[J].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03(2): 56-63.
- [8] 王树声, 李欣鹏. 中国城市新旧城空间规划的历史经验[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48(5): 696-703.
- WANG Shusheng, LI Xinpeng.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spatial plann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parts of the cities in China[J]. J.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6, 48(5): 696-703.
- [9] 山西省水利厅. 汾河志[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6(1): 16.
-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 of Shanxi Province. Records of Fenhe river[M]. Taiyu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10] 朱玲, 顾子卓, 孙亚洲, 等. 汾渭平原历史城址分布规律及自然适宜性关系研究[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56(3): 348-357.
- ZHU Ling, GU Zizhuo, SUN Yazhou, et 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historical city sit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natural suitability in the Fen-Wei plain[J]. J.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4, 56(3): 348-357.
- [11] 马俊才. “新田模式”与三晋都城探讨[J]. 三代考古, 2021(00): 479-507.
- MA Juncai. Discussion on “Xintian model” and Sanjin capital[J]. Three generations of archaeology, 2021(00): 479-507.
- [12] 陈宏胜, 周小涵, 肖扬. 基于“应然”视角的国土空间规划的演变与作用探讨[J]. 中国名城, 2022, 36(5): 3-8.
- CHEN Hongsheng, ZHOU Xiaohan, XIAO Yang. Discussion on the evolution and function of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ought to be” [J]. China Ancient City, 2022, 36(5): 3-8.
- [13] 李小龙. 关中地区县城空间格局的历史营建研究[D].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
- LI Xiaolong.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Genes of Urban Spatial Pattern in Guanzhong Counties[D]. Xi'an: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2020.
- [14] 王树声. 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的现代意义[J]. 城市规划, 2019, 43(1): 50-57.
- WANG Shusheng. Modern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urban planning traditions [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9, 43(1): 50-57.
- [15] 高元, 韩冰倩, 张薇, 等. 关中城市山水人文空间格局解析及区域关联网络构建[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55(6): 898-904, 937.
- GAO Yuan, HAN Bingqian, ZHANG Wei, et al. Analysis of urban structure of landscaping and cultural spaces in Guanzhong c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verall network of regional correlation [J]. J.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3, 55(6): 898-904, 937.
- [16] 李欣鹏. 区域历史遗产网络的文化内涵和理论思考——基于中国传统人居思维的“整体性”和“关联性”[J]. 中国名城, 2021, 35(8): 68-73.
- LI Xinpeng. Regional heritage network culture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thinking: Based on traditional living thinking of “Wholeness” and “Correlation” of China[J]. China Ancient City, 2021, 35(8): 68-73.
- [17] 张兵.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文化遗产区域整体保护的新类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5(6): 5-11.
- ZHANG Bing. Historic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A new category towards regional and integral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5(6): 5-11.
- [18] 邵甬, 关星. 再探区域性历史文化空间价值特征——以丹沁古灌区为例[J]. 城市规划, 2023, 47(10): 30-42.
- SHAO Yong, GUAN Xing. Re-exploration of the valu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space: The case of ancient irrigation area of Danhe and Qinhe rivers[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3, 47(10): 30-42.
- [19] 张若曦, 吴濯杭, 林怡.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立法的责权利关系研究: 以《泉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制定为例[J]. 中国名城, 2023, 37(7): 90-96.
- ZHANG Ruoxi, WU Quhang, LIN Yi. The research of responsibility-power-interest relationship in the legislation on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 conservation: An example of the ordinance formulation on Quanzhou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 conservation[J]. China Ancient City, 2023, 37(7): 90-96.
- [20] 许龙, 张涵昱, 汪琴.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规体系建设策略[J]. 中国名城, 2021, 35(11): 74-79.
- XU Long, ZHANG Hanyu, WANG Qin. Construction strategy on the legal system of Chin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protection[J]. China Ancient City, 2021, 35(11): 74-79.
- [21] 王军, 李梦, 李小龙, 等. 系统观指引下的省域保护传承本土化体系构建探索[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56(3): 445-455, 474.
- WANG Jun, LI Meng, LI Xiaolong, et al. Exploration on construction of localization system of provinci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system view[J]. J.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4, 56(3): 445-455, 474.